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十一）

# 刘宓庆翻译散论

刘宓庆 著  
王建国 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的理论——哲学的、史学的、文学的、心理学的、地质学的、社会学的，当然还有翻译学的——必将伴随地球在太空中旋转的轰鸣呼啸，伴随被启明星唤醒的东方大地的搏动，伴随旭日普照下亚洲腹地的蒸腾，风行于世；中国的理论已经从公元1500年以来的沉睡中苏醒，我敢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理论的发展，就算美国、日本和西方其他角落里所有的“屠龙勇士”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是——窝自不量力的蚍蜉，妄图撼动拔地而起的参天大树。

——摘自：《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十一《四十年学术人生》

The millennium between the sixth century, when the Sui dynasty restored imperial unity, and the sixteenth, when the Westerners began their intrusion by sea, was for China an era of unparalleled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ability. But this stability paradoxically proved to be a curse as well as a blessing. ...The end result, then, was the disruption of the beautifully balanced but conservative Chinese society by the irresistible expansionism of the West. Despite this outcome, we should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for a full millennium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led the world by its sheer viability and by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human heritage.

—L.S.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pp.211-212, Chapter 13, 1999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十一)

# 刘宓庆翻译散论

刘宓庆 著  
王建国 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宓庆翻译散论/刘宓庆著,王建国编.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4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ISBN 7-5001-1543-1

I. 刘... II. 刘... III. 英语-翻译理论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2819 号

---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箱/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责任校对/立 序

封面设计/李 雷

印 刷/北京奥鑫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7.5

版 次/2006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1-5 000

---

ISBN 7-5001-1543-1/H·467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内容概要

---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2005—2006)共十一部,各部著作主要内容如下:

《文体与翻译》(1998):选取了新闻报刊、论述、公文、描述及叙述、科技和应用等文体进行了英汉翻译的探讨。其中,作者指出了各个文体所包含的范畴、文体特点以及汉译要点。除了第七个单元主要是理论探讨之外,其他六个单元都有专门的翻译方法论的探讨。

《翻译美学导论》(2005,修订本):从翻译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的观点出发,探讨了译学的美学渊源、翻译的审美客体、翻译的审美主体、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翻译艺术创造的基础层级、翻译艺术创造的综合层级、翻译审美理想和审美再现问题,以及西方美学对中国译学的借鉴意义等课题。

《翻译与语言哲学》(2001):探讨了翻译理论研究方法论、本位与外位、主体与客体、翻译理论的哲学视角、语言观与翻译理论、翻译学的意义理论、中国翻译学意义理论架构、翻译思维、翻译中语言逻辑、翻译的价值观、新翻译观和翻译批评等课题。

《文化翻译论纲》(2006,修订本):从翻译学视角对语言中的文化信息、文化翻译观念、文化与意义、语义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翻译与文化心理、文化翻译的表现论展开了探讨。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2003):对翻译与翻译教学、翻译实务

教学、翻译理论教学等课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口笔译理论研究》(2004):首先阐述了维根斯坦的语言观与翻译的关系,而后对口译的传播行为、口译传播的认知论证、口译的对策论、口译的方法论进行了研究,并对译学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005):立足于中西译学的对比。一方面,探讨了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其中重点讨论了严复的翻译思想以及墨家思想对译学研究的启示,提出了中国译学的建设必须重视反思·超越·重构等三个阶段,以及“还形式以生命”的观点;另一方面对西方当代译论的源头、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及流派以及西方当代译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探究,对维根斯坦的意义观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再次做了概括,指出了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游戏”的特征;此外,还对本杰明的翻译观、翻译的原创性,以及翻译超越原语的途径和特征进行了讨论。

《英汉翻译技能指引》(2006):主要指导自学者如何提高翻译能力,并对译文操控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2005):是刘宓庆翻译思想的一个总体概括。其中涉及到翻译学的性质及学科架构、翻译理论基本模式、翻译的意义理论和理解理论、翻译过程解析、翻译思维、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翻译的程序论、翻译的方法论、翻译美学、翻译风格、翻译的技能与技巧、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等课题。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2006):以翻译为本位进行了汉英对比研究。其中,作者系统地考察了汉英语法特征,探讨了汉英主语、谓语句和宾语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进行双语转换的问题;同时,作者还对汉英语言结构的多个层次和范畴进行了对比研究:汉英短语、句式、语段、语序、被动语态、时体差异、“虚拟”表示法、表现法、词、思维方式等。

《刘宓庆翻译散论》(王建国编,2006):主要包括刘宓庆各个时期的论文。

#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刘宓庆翻译思想研究

王建国

华夏译事发轶于远古,历史源远流长。据考究,我国首篇重要的译论可追溯到支谦的《法句经序》(方华文,2005:1)。从此,我国的译学研究可谓生生不息,留下了丰富的译论遗产。王宏印、刘士聪(2002)把中国传统译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肇始、古典、玄思、直觉四个阶段。综观这四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译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无不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即始终没有离开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战略考量。汉代的佛经翻译,为中国翻译扎下了根基,及至明代徐光启等的科技翻译则使中国翻译与中国的国民教育和国民经济正式结合了起来。清朝末期,列强侵华战争频发,中华民族遭到肆意凌辱,为民族的生存,中国翻译从自在状态走向了自为状态,自觉把翻译当作武器,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华民族倍受蹂躏而奋起抗争期间,我国进行了大量政治、文学等方面的作品翻译,旨在启蒙心智、救国救民,对翻译理论进行了深邃而又严肃的思考,尤其是对引进西学而拯救国民的翻译策略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切百废待兴,中国译界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自董秋斯(1951)始,一批学者提出了加强翻译理论建设

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春秋,中国的国力日益强盛。与此同时,无论是着眼于现在,还是着眼于未来,中华儿女都在自觉地为中国的更加强盛和繁荣努力奋斗,中国译学学者也概莫能外。刘宓庆(2005:30—33)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梳理了中国译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翻译仍然必须坚持文化战略考量,指出“翻译是强国富民方略的组成部分,翻译本身要走实业化的道路”,中国翻译正在经历着自徐光启、严复分别引导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之后的第三次质的飞跃。

当今,我国学者在译学探索过程中,在秉承着发展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对翻译在文化交流和振兴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本身发展的方略等重大问题上延续了五四以来的辩论传统。面对着国势昌盛,面对着西方译学的理论迭出,面对着我国传统译学的局限,学者们都必须或已经为自己的研究定好了取向和坐标。刘宓庆就是当代中国译界一位杰出的代表。在中国翻译事业第三次质的飞跃过程中,他倡导立足于中国,重建中国译学传统,悉心吸收西学精髓,建立中国翻译学。在四十年的译学探索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他表现出了许多非凡之处。他在1985年出版了《文体与翻译》,撒下了第一粒以科学精神和方法研究实务与理论的译学思想种子,最后长成了十棵“血脉相连”的大树,宏观与微观,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无所不及,犹如编织成了一张大网,几乎总能让译学学者在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中国译学和世界译学的发展方略绘制了蓝图。

## 1 刘宓庆翻译思想发展脉络<sup>①</sup>

### 1.1 三个阶段

刘宓庆在《四十年学术人生》(1965—2005,见本书)中回顾了他长达四十个春秋的理论探索历程。我认为,他四十年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注我国译学传统。

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以文本为切入点,目的在于实现从以主体为关注中心到以客体为关注中心的文本研究,但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取向。《文体与翻译》(1985,以下简称《文体》)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宓庆先后在比利时、法国等欧洲国家学习西方哲学,并开始研究维根斯坦哲学;90年代执教于香港,开始了以功能主义为取向的译学研究。《翻译与语言哲学》(1995,以下简称《哲学》)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第三阶段: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开始以功能主义为主、兼取结构主义之长的综合研究取向。《新编当代翻译理论》(2005,以下简称《新当代》)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个时期,也就是当代的刘宓庆翻译思想特点突出地表现在:

1)意义观的大改进:(1)强调动态的意义观;(2)强调交流中的意义把握;(3)强调传播效果;

2)形式观的新发展:提出“还形式以生命”,提倡形式的功能观;

3)对策论核心思想的推进:借助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论,从重视“对应”到重视“代偿”。代偿(compensation)指以词汇代形态,以“解释”代“对应”,主张广泛使用“同义替代”(substitution)以利行文中表现文化特征并实现审美考量。

## 1.2 基本理论主张

在长达40年的全视界译学理论探索中,刘宓庆一步一步地提出了相当完备的系统化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分布在以下五个方面:

1)提出翻译的文化战略观;指出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

2)理论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在此基本指导原则的指导下,刘宓庆的研究做到了以下几点:

(1)重意义、重描写、重功能;



(2)重审美,强调语言生成(构建)与审美判断的“嵌合”(incorporation);

(3)重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理论的体系化;

(4)强调文化战略考量;

(5)重整合,强调学科构建。

3)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范畴的研究;

4)主张革新并完善中国译学的“对策论”;指出对策研究是功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此,刘宓庆认为,西方译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对应”,而中国译论的对策论(译文操控理论)核心思想应为“功能代偿”<sup>②</sup>,其特征如下:

(1)以汉语的词汇手段“代偿”一切英语的时态、语态、语气、时体等形态语法意义;

(2)以动态化的“解释”代替“对等”的静态考量;

(3)以“同义替代”超越文化心理障碍;

5)大力加强翻译教学事业的建设<sup>③</sup>。

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教学应该有一个与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手段相称的高定位和目的性,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翻译教学应有理论指导,教学思想必须科学化,扬弃将课堂当作教师诠释个人经验的场所的“经验主义套路”(Empiricist Approach)。

从整体上看,《全集》中主要的修订体现在前四点基本理论主张上,尤其是第一、第三和第四点上。下文试以贯穿刘宓庆译学研究的整体性整合研究观<sup>④</sup>对《全集》中的翻译思想作出阐述,并重点介绍刘宓庆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建立在维根斯坦语言哲学上的功能主义翻译观,指出刘宓庆翻译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

## 2 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整体观<sup>⑤</sup>

### 2.1 翻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

《全集》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加强了翻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sup>⑥</sup>,把翻译思想建立在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提出了功能主义翻译观。刘宓庆对翻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集中体现在学科架构示意图(见《新当代》1.3)和翻译学多维共同体之中(见《新当代》1.4)。

可以说,刘宓庆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译学的这两个系统展开。但是,他的每部著作中又各有侧重,侧重点如下:

(1)《新当代》、《口笔译理论研究》(2004,以下简称《口笔译》)注重对翻译学各个范畴及次范畴研究的综合论述;

(2)《文体》、《英汉翻译技能指引》(2006,以下简称《指引》)、《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1990,以下简称《对比》)、《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2006,以下简称《新对比》),相对集中于“程序论”、“对策论”、“方法论”的探讨;

(3)《翻译美学导论》(2005,修订本,以下简称《美学》)、《文化翻译论纲》(2006,修订本,以下简称《文化》),相对集中于“价值论”、“效果论”的探讨;

(4)《哲学》,相对集中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探讨;

(5)《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2003,以下简称《教学》),相对集中于“对策论”的探讨;

(6)《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005,以下简称《中西比较》),相对集中于“本体论”、“认识论”的探讨。

在各个范畴研究中,刘宓庆都提出了鲜明的观点。第一,方法论:刘宓庆探讨了汉外转换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初学者宜遵循的实践途径;第二,对策论:刘宓庆提出了“用顺畅的汉语翻译外文”、以功能

代偿为核心的译文操控论;第三,本体论、认识论:在以维根斯坦语言哲学观为基础的功能主义翻译观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需要整体性整合研究等译学基本理论原则、“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译学研究的基本指导原则,并探讨了翻译理论的实质、当代译学最重要的问题,构建了意义理论和理解理论;第四,价值论:指出了中国译学与中国哲学—美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强调中国译学建设必须注重文化战略考量等。

必须强调,我们这里的分类依据是每部著作所重点论述的翻译学范畴。因为,刘宓庆的每个翻译学范畴的研究也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即各专著在重点讨论某个具体的范畴时,同时也关注其他范畴的研究。例如,《美学》在重点探讨译学价值论范畴并提出中国译学一直和中国哲学—美学有着长久的渊源的同时,也同样涉及到翻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范畴的研究;《文化》不仅重点研究了文化翻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范畴,其中更是提出了“中国译学必须注重文化战略考量”的重要价值观;《口笔译》则探究了口译的多个研究范畴。

## 2.2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刘宓庆指出,在整合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本位观照,外位参照”<sup>⑦</sup>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对外国理论要善于作出判断和分析,对外国理论要分清“源”与“流”<sup>⑧</sup>。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观最早是刘宓庆(1996)在《翻译理论 research 展望》一文中提出的,后来他在《哲学》中更明确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形成了‘静态研究为体、动态研究为用’的整体论比较观,……。在后来的一些翻译研究著作中我一直恪守着这些原则主张,并在《翻译与语言哲学》提出‘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基本价值论观,当然也是比较研究的对策论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刘宓庆译学研究的多个层面上,例如,对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划分、译学为本位而其他学科为参照的研究、中学为本位而西学为外位的研究,等

等。

### 2.2.1 “本位观照”——中学(国学)对译学的参照

在《全集》中,以译学为本位,国学中作为外位的参照学科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汉语语言学等。就具体著作而论,《文体》借鉴了至80年代初期为止我国语言学学界的研究成果;《新对比》以汉语为本位进行汉英对比,指出了汉语富于感性、重在意念与语法隐含的特征以及汉英翻译的策略,提出了中国译学的方法论思想;《美学》探讨了中国哲学—美学与中国译论之间的关系。该书中指出,中国传统译论不仅借鉴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思想和审美范畴或形态,还沿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还根据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些二项式的相对相融的审美原则,引申出了翻译审美理想中相对相融的审美原则;《文化》<sup>①</sup>则依据中国美学思想把审美糅进文化翻译策略中,给文化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考察提供了新视角;《指引》结合“辞达”这个儒家古老的语言美学命题,分析了我国翻译大师的特点,提出了做到用“欣畅”的汉语进行翻译的原则。

《新当代》中作者提出,中国译学研究者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此,作者在阐述译学基本理论原则时指出,中国的翻译理论应以汉外之间的转换规律为研究对象,扩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际转换理论研究。据此,作者从汉语语言学、中国美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与风格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之所以有其个性的原因,并提出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进行双语转换中必须将“功能代偿”作为对策论的核心思想。

《中西比较》是作者最近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墨子思想与中国译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翻译学应该师墨的原因有:墨家重用、重经验、重身体力行;墨子重知性思维、逻辑思维;重语言哲学探讨;重兼蓄包容;重艰苦自持、独立无畏的志气。作者指出,译学学界当前必须尽可能发掘和重估中华民族文化思想资源,肯定墨学的现代价值,重构中国译学传统。最后,刘宓庆还总结了古代

中国的意义观并重构了一个有中国译学特色的意义理论框架。

### 2.2.2 外位参照——西学对译学的参照

在《全集》中,以译学为本位,西学中作为外位的参照学科主要指西方语言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以及传播学。这总体表现在,刘宓庆借鉴西方哲学,尤其是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构建了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范畴思想,借鉴了西方美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家族构建翻译学的方法论、对策论和价值论范畴思想。在各个著作中,《文体》主要倚重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功能文体学进行英汉翻译的方法论探讨,同时,还借用了转换生成语法的思想,提出双语转换必须对语言的深层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新当代》应用系统论的思想提出了翻译学学科架构和翻译多维共同体,对翻译学的各个范畴研究加以阐发,并依赖建立在维根斯坦语言哲学观基础上的功能主义翻译观统括全书的主体部分;《新对比》借鉴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等学科的理论把对比研究建立在较高的理论高度;《美学》修订本中专门增加了“西方美学”一章,从译学本位视角对西方美学进行了梳理并加以借鉴。该书中,作者指出,“情”是中国文艺美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而当今西方却少有从美学视角对情感作深入审视的研究者;但是,西方现代美学对感觉的研究告诉我们,译者应不应该译要看自己对所译对象有没有感受;对直觉研究的成果可以印证翻译具有以视听感官运作为基础的原创性和翻译行为的艺术性;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研究可以论证翻译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以及译者必须对翻译有一种整体性体验、体认和体悟的观点。作者还借鉴了“模仿”这个西方美学中的表现法命题,指出西方美学对模仿的研究可以支持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以及“翻译是艺术”、“翻译也是原创”等主张,并为译学中的模仿提供审美认知的科学参照,为翻译表现法打开了美学描写的视角,有助于翻译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

《哲学》是一部重点借鉴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译学的著作。作者在

对西方语言哲学进行了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哲学视野下的翻译理论、翻译的价值论等问题,其中重点审视了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翻译的意义理论、翻译思维、语言价值观和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等问题,构建了翻译学的意义理论框架,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翻译研究指导准则、新的翻译观、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以及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具体任务;《文化》中,作者首先指出,正是由于受哲学家胡塞尔的影响,他才选择了荆楚文化和爱尔兰文化为探讨文化翻译的两个理想客体<sup>⑩</sup>,并确立了本书写作的主旨性方法论。同时,作者还结合心理学学科家族对文化心理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借鉴了利科所指出的原型(prefiguration)⇨构型(configuration)⇨成型(transfiguration)模仿三级阶段论,阐述了翻译中体现原汁原味的模仿原则。

刘宓庆在《教学》和《口笔译》中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构建功能主义翻译观,并在《中西比较》和《新当代》中对这种翻译观进行深入地阐发,使之系统化。《教学》综合了该书之前的研究成果,因而在多个范畴研究中还借鉴了语言学、美学、文化理论、释义学、认知心理学、传播学和符号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口笔译》也同样借鉴了西学的多个学科理论,例如,认知语言学、传播学等等。《指引》是一部探讨翻译技巧和技能且以训练为主的著作,其中提出的顺译理论借鉴了二语习得理论中的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理论进行了解释论证。

### 2.2.3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他解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还有“以中国当代译学为本位,中国传统译学为外位”以及“以中国译学为本位,西方译学为外位”等多种理解。

我认为,就“以中国当代译学为本位,中国传统译学为外位”理解而言,刘宓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体》借鉴了傅雷的“神似论”等传统的优秀翻译思想阐述了“翻译三论”;《文化》(第78页)中借鉴了梁

启超的“治洽调和”思想,提出了文化翻译原则即歌德模式:C1 $\Rightarrow$ (通过)C2 $\Rightarrow$ (到达)C3,指出C3是C1与C2的“治洽调和”;《中西比较》归纳了中国翻译传统的四个特点<sup>①</sup>,并指出这些特点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的翻译思想,挖掘了中国译学思想的演进和发展轨迹以及中国主流文化对翻译的态度,指出了中国译论始终将,而且还必须将继续将翻译视为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作者认为,中国翻译经历了三次质的飞跃<sup>②</sup>，“圆满调和”是中国翻译越千年之思想主旨,阐述了中国译坛始终没有形成有规律的、阵线分明的共存式流派。这些对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为作者构建当代中国译学的新传统观作了扎实的铺垫,并有力地说明了必须建设当代中国翻译学的原因。

就“以中国译学为本位,西方译学为外位”理解而言,《文体》对奈达(Nida)等人为代表所发展的欧美翻译理论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刘宓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西比较》中。作者通过中西译学比较的方式重点挖掘了中西译学传统,对中西翻译发展的分期与模式做了十分细致的划分和对比研究。由此,作者指出了中国翻译发展的模式特点有:1)中国翻译及理论研究具有十分独特的文化战略考量;2)中国翻译始终将意义放在第一位;3)中国翻译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本书中,作者肯定了20世纪最后25至30年,西方译论从五个大的维度——结构与意义、意义与交流、意义与文化、意义与认知、翻译与社会政治——拓展了翻译思想,深化了理论认知;具体说来,就是在对待意义、结构、形式、功能等四个基本层面的问题上有了更符合翻译实际和时代诉求的翻译基本原则和理论主张。但是,作者严厉地批判了当代西方译论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唯技术论”倾向等多种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局限性。另外,本书还专章论述了本雅明(即本杰明)的翻译思想。作者这些对西方译论正本清源的工作为构建当代中国译学的新传统观明确了方向,澄清了认识。

《新当代》是另一部较为全面地体现以上两种理解的著作。作者

提出,中国译学研究者的首要工作是:1)理清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沿革,绘制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历史发展路径图;2)深刻揭示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哲学、美学的思想源流;3)对中国翻译传统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评析和总结。从发展当代中国译学的角度来看,这体现了中国当代译论为“本位”而传统译论为“外位”的思想。

《新当代》除了研究翻译的共性之外,重要的特色就是高度强调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这在作者指出的译学研究者必须做到的首要工作中已经有所体现。此外,作者从四个角度<sup>⑩</sup>对中国翻译理论主要特色的探讨以及作者指出的当代翻译理论必须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之中(《新当代》:v),都体现了体现了作者一贯以中国译学为本位、西方译学为外位的基本价值观。

另外,刘宓庆各个专著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从本位和外位观来看。例如,《美学》的本位是翻译美学,其他研究翻译的学科则为外位;《教学》的本位是翻译教学,其他研究翻译的学科则是外位,等等。

### 3 维根斯坦哲学观照下的功能主义翻译观

功能主义翻译观是当代刘宓庆翻译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

#### 3.1 翻译是语言游戏

刘宓庆根据维根斯坦翻译属于“语言游戏”的观点指出,翻译(口译和笔译之间存在家族相似,因而都是语言游戏)为语际的语言游戏是翻译功能观的最基本的思想;正如维根斯坦所言,所有“游戏”都有规则,所有的游戏参与者都必须在参与游戏之中学会遵守规则,并且在学会遵守规则中做到能驾驭规则,才能使游戏成功;译者应该正确理解翻译的游戏规则并在游戏中努力把握规则和驾驭规则;由于任



何游戏都重在参与,为此,对翻译而言,直接经验无疑是最重要的。

刘宓庆指出,翻译游戏的基本原则是解释,译者的基本职责是传播媒介,基本功能是职能保证下的参与,基本权力是对交流的相对操控,基本行为准则是能动而不僭越。

### 3.2 翻译必须在语言交流中把握意义

刘宓庆根据维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观点指出,因为意义“肯定必须属于某一语言的某一语境”,而语境使意指确定化、具体化为此情此景的“对象”,所以要把握意义就要把握语境。因而,翻译游戏最基本的法则就是必须把握互为条件的“语境—用法—意义”之间的联系。

### 3.3 翻译游戏要符合“生活形式”

维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和依据,也是所有语言游戏最高也是最基本的规则。因此,刘宓庆指出:

(1)“生活形式”是翻译游戏的本体论基本规则。由于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具有相似性,相似性又都必然要依附在其本质特征中,因此,翻译有理由扩大意义转换的对应幅度;

(2)“生活形式”是翻译游戏的价值论基本规则<sup>④</sup>。翻译游戏作为一种生活形式,其参与者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翻译行为必须接受生活形式的检验,并服务于生活形式。“生活形式”作为翻译理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论证中国翻译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哲学理论依据;

(3)“生活形式”是翻译游戏的表现论基本规则。翻译表现论的研究目的是要让一切意义运筹落到实处。翻译的表现论特色包括三个方面的标准:话语表意的明晰性、语句意涵的连贯性、语体的适境性。